

目 录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1)
“宁粤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	(45)
“非常会议”前后·····	周一志	(82)
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	孟 曦	(101)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	贺贵严	(112)

短稿十篇

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	恽宝惠	(119)
郑汝成之死·····	陈一叶	(120)
袁世凯之死与唐天喜之背叛·····	陶树德	(121)
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	邓汉祥	(122)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郑庭笈	(123)
九六公债发给利息的一段公案·····	周士观	(125)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反蒋的一个起因·····	南桂馨	(126)
回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魏自愚	(126)
李生达之死·····	王尊光	(127)
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	宋希濂	(128)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王化一	(131)
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	张凤仪	(148)

附注

对《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十二辑一五五页、第十八辑二
二〇页

对《“宁粤合作”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二辑一五六页

对《“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十八辑二二一页、第二十三辑二二七页

对《郑汝成之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
二十三辑二三二页、第三十四辑二五八页

对《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一文的补
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三页

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在旧中国，大公报是创刊比较早也比较重要的报纸之一。它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斂之。到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斂之将大公报盘售与王郅隆。王郅隆接手经营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九个月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续刊，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大公报于六月十七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于人民所有。由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旧大公报共有四十七年历史。我们叙述旧大公报的历史，拟分为两段：前段叙述英斂之经营的时代，而将王郅隆续办的时代附入，统称为“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后段叙述吴胡张时代的旧大公报。这里谈的是前段。

一九〇二年这个历史年代

“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①旧大公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

① 廖盖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见《新闻战线》一九六〇年八期三页。

九〇二年是个重要的历史年代。这年是庚子年义和团起义的第三年,辛丑条約簽訂的第二年。大公报創刊的日子,距离八国联軍攻破天津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不滿两年,距离辛丑条約的簽訂(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还不滿一年。这时候,天津还被八国联軍占領着,由八国联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統治着。大公报在这时候創刊于国破民奴的天津,而且报館就設在天津的法国租界里,真可謂不平常。

庚子起义,是由反帝反教而起。天津人民曾經掀起两次反帝反教的大风暴:一次是一八七〇年火烧望海樓的教案,再一次就是庚子起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天主教徒假借洋势欺压同胞,就訴諸烧教堂打教徒的直接行动。旧大公报創辦于帝国主义直接統治下的天津,而且是由天主教徒主办,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自然是很清楚的。

时代是在二十世紀初,这时中国的資产階級已經初步形成。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間举办的厂矿企业,資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已有一百二十二家,資本总数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①。戊戌变法,就是新兴資产階級的維新运动的演出。这时候,新兴的資产階級正在发展,戊戌变法的思想正深刻地影响着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旧大公报創刊的編輯思想,也反映着資产階級改良主义思想,这是为資产階級(包括买办資产階級)利益服务的。

英斂之这个人

英斂之(一八六六——一九二六)这个人是很自負的。他在壬寅(一九〇二,即創辦大公报的那年)日記的扉頁上題着这样一首

^① 吳玉章:《辛亥革命》二至三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詩：“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

英斂之，姓英名華，字斂之，又號安塞，滿洲正紅旗人^①，一八六六年生於北京。他的妻子是皇族，姓愛新覺羅，名淑仲。英斂之幼年家貧，出身寒微。據說他的父親和長兄都是體力勞動者，英斂之自我奮鬥，讀書靠自修。由他起，英家轉換了門庭，階級起了變化。英斂之的文集《也是集》《自序》說：“仆以一武夫，不屑於雕蟲刻篆。顧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倆，見遺於社會，無補於身家，遂棄之。弱冠後知耽文學，則又以汜濫百家、流覽稗史侈淵博；甚至窮兩月之目力，讀《四庫提要》一周，亦足見其涉獵之荒矣。”他所以習武，因為旗人照例要學武，並且可以入軍籍，得糧餉。他少年時致友函中有一節說：“予以家貧親老，無以為養，兼之多事待了，債負滿前，每以拙于生計為憂。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時，得補糧餉，尚為一綫之路。所以不憚煩勞，每日挽六力弓逾百勝也。但祝彼蒼，憫予苦心，曲賜矜全，則一枝有托，不復奢望矣。”可見他少年習武是為了生活，苦讀學文，希望得到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英斂之自二十二歲信奉了天主教^②，自習了一些法文，從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國神甫發生了關係。據說英斂之在三十歲以後才結婚，這時他已經

① 關於英斂之是否滿洲旗人，曾經考證。《清史稿》中《文苑三》《斌良傳》內附有《英華傳》云：“英華，字斂之，赫佳氏，正紅旗人。”赫佳氏是滿族的姓氏，如愛新覺羅氏、叶赫氏、瓜爾佳氏等。英斂之和金梁友好，金梁參與《清史稿》的編纂，遂將《英華傳》編入《清史稿》。這個短短的傳稿是經過英斂之的同意的。據《欽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上卷三十七頁載：“赫佳：原註，赫佳為滿洲一姓，其氏族世居雅蘭及訥音地方。”英斂之是滿族人是毫無疑義的。

成了文人，經他學文的老師介紹，與愛新覺羅淑仲結婚。英斂之的《也是集》內附有淑仲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所作的詩四首，韻律甚工，文化程度很高，不是寒家女子。英斂之以一個滿洲旗人，生在滿清末季，朝廷腐敗，外患嚴重，他一面恨家國不振，同時接觸到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潮，因此在崇洋思想中希望變法維新。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後，英斂之也在戊戌三月（一八九八年四月間）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議論國事。文中把北京諺語所說“皇上是傻子，王爺是架子，官是搜子，兵是苦子”的話加以闡釋；文章并附和了康有為的政見：“康主政有為膠州疏內‘蔽于耳目，狃于舊說’諸語，實今日之頂門針、對症藥，痛快切當，言人之不敢言。”頂到這年九月“戊戌政變”，慈禧再出訓政，光緒被囚，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康有為逃亡，英斂之恐被株連，也逃至天津，搭太古“重慶”號輪船去上海。他在船上遇到康有為，彼此交談，不知姓名。這可見當時他和康梁維新派還沒有聯繫。據現在的英斂之的日記，他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得到了一個職業，充當法國駐蒙自領事館的館員。蒙自縣在雲南南部，滇越鐵路經行其地，一八八七年依據《中法續議商務專條》，辟為商埠。英斂之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初偕法國領事從天津啟程，經過上海、香港、海防、老街至蒙自。英斂之到蒙自的時候，法國正在籌劃建築滇越鐵路，他在蒙自幫助法領事購買民間土地。在蒙自地方，法國和天主教的勢力已深深侵入，在英斂之等到來之前，蒙自曾經發生過燒教堂打神甫的反教事件；英等到後，又傳當地人民將繼續起來鬧事。因此法領事要求中國地

② 據英斂之《雜存稿》中《曾侯日記書後》一文中說：《予自二十二歲信教以來，至今已近五載。》一八九二年壬辰年作。據此知英氏生於一八六六年，并自二十二歲信奉天主教。

方当局允許他們調法国兵来保护領事館，中国未允。随后听到义和团在北方起义以及八国联軍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英斂之感到心神不安，想辞职北返，另寻职业。法領事也担心地方不靖，决定离开蒙自。在七月中旬，英斂之随法領事离开蒙自，經越南、香港、上海，于八月下旬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到九月中旬法領事准英辞职，給他最后的一次薪水五十元完事。英在天津勾留了一个多月，因大乱之后，津京交通多阻，未能去北京，在天津也寻不到职业，乃于十月中旬借法国“白神父”南行之便，同船到上海。英到上海后，也找不到职业，妻儿相随，开销不小。他先給一个名叫“温伯彦”的英国人教“官話”，以后又給华俄道胜銀行的一个比利时人“欧某”教話，又給荣华洋行一个名叫“翁德林”的德国人教話。每天早午晚分三次到各处各教話一小时，翁德林月送“束修”十元，其他二人的学費大概也是这个数目。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无聊的。在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斂之又从上海回到天津。

这次回到天津，情况不同了。一个天主教徒資本家柴天宠提議集股开办一个报館，由英主持。此事极为順利，經過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到轉年（一九〇二）夏就創刊了《大公报》。一九〇五年夏英斂之应日人之邀，游历过日本。英斂之主持大公报十年，到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他就沒有办报的兴趣了，从此退休，移居北京香山靜宜园。至一九一六年将大公报出兌給安福系資本家王郅隆。（英斂之創辦大公报，由提議到办成的具体經過，詳述于下节。）

英斂之退居北京香山靜宜园后，专心钻研天主教义。因所居靜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論文，出版了一本《也是

集》。英因主持大公报而馳名，退休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首領，当时有“南馬北英”之說。南馬是馬良，字相伯。英、馬二人有几十年的交情。英和熊希齡的关系也好。一九一七年华北大水災，熊任賑災督辦，在北京設慈幼局，聘英为局长。一九二〇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山慈幼院，英不久即辞职。英在香山設立“靜宜女学”，又設立“輔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英斂之又以美国的关系，在北京設立“公教大学”，后改为“輔仁大学”，自任第一任校长。英晚年在北京办教育，办慈善；每年冬天募賑款，在香山开粥厂，賑济貧民，所以在地方上頗得附近居民的好感。英斂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在北京病逝，年六十岁。

当时这个报的階級背景

报纸从来就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旧大公报創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其时其地，都是极不平常的。那末，它的階級背景是什么呢？研究了有关的历史資料，我們弄清了旧大公报的階級背景。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由一个受天主教教养的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滿洲旗人，利用天主教和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一部分金錢，以及买办資产階級等的投資办起来的一家报館；这可說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資产階級等的混合物。

英斂之夫妇都是清皇朝的本族，出身于天主教徒，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又結交了許多买办資产階級分子，他个人也变成一个帶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英斂之一身表現着两个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另一个是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方面，他坚决站在滿族保皇的立場；在階級矛盾方面，他一般地是跟着买办

資產階級走。英斂之最初的一个职业(駐蒙自法国領事館館員)就来自天主教的关系,所往来接触的尽是中、法、比各国的天主教人物;当时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潮的影响,头脑里搞成一套君主立宪的思想体系,以为救国之道只有保皇立宪以永保“大清天下”的一条路。英斂之的言論主张,主要在于保皇立宪。他呼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拥护光緒皇帝亲政;在保皇的条件下贊成維新,坚决反对共和革命。他是个滿族保皇派,他的保皇主张,比康梁还坚决得多。为了實現保皇立宪的理想,为了达到永保“大清天下”的目的,他就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投靠洋人。英斂之头脑里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保皇与崇洋。他保皇保到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完了,就洗手不办报了;崇洋崇到滿脑子的“二毛子”思想。

我們研究旧大公报的历史,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旧大公报在一九〇二年創刊于天津,館址在法国租界,报头上加刊一个法文名字“L'Impartial”(无私的意思),决非偶然的事情。我們最初总以为英斂之是天主教徒,主要的股东也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所以旧大公报就沾染上亲法的色彩。現在明白了問題真相并不这么簡單,而是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在政治上托庇于法国的势力,在經濟上也摻入了法国的金錢。据英斂之的辛丑日記,他在一九〇一年春天由上海回到天津,环境是国破家亡,个人情况也极其无聊。他回天津的第三天(四月二十六日,旧历三月初八日),首先去看柴天宠,并送了一些礼物給柴,柴約他到家里吃午飯。日記上即說:“柴先生等愿設报館,約予主持其事,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垫云云。”柴天宠,字敷霖,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总管。柴是个天主教資本家。他最

初經營一个“天和号”，专售建筑材料，并承包各种建筑工程，由于承包天主教堂及教堂房产的工程发了財。紫竹林教堂的产业和外交事务皆由他負責，并兼管教务，总管一切。由于有錢，他还投資經營各种工商企业。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邳隆，字祝三，天津东大沽人。他的先人是代粮商掌管运粮船的，他本人作粮食和木厂的捐客，又經營元庆木号兼包工，因此与柴天宠有联系。王好賭博，会“吃腥”（賭博作弊騙人），在賭場上贏了很多錢。他就因为賭博的关系，联系上北洋軍閥，特別勾結上倪嗣冲。倪嗣冲任安徽督軍时，委任王邳隆在天津設安武軍后路局，以王为总办。王以整列火車运大米到天津，不出運費，把米卖給日本，大賺其錢，成为安福系的官僚資本家，是个亲日派。英斂之于一九一六年把大公报卖給了王邳隆。据說王邳隆购买大公报館，錢也不是他自己出的，而是安福系几个大头目在天津安徽会馆賭博抽的“头錢”。天津方面拿錢入股的重要人物，还有张連璧，字少秋。他和他父张丹秋两代經營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荣华洋行經銷德国五金顏料杂货，所以张氏父子又先后開設恆义号洋广杂货店、万聚恆洋广顏料店、瑞記布庄等，接售荣华洋行的来貨。张連璧很有錢，現在天津承德道上的“連璧里”，就是张所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名此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股东名李敬字，天主教徒，是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柴天宠一面在天津募股，英斂之一面到北京按照天主教的教規向法国主教“請示定夺”。法国“樊主教”（华名樊国樑）贊成办报，并入十股。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旧历六月二十日）日記云：“进堂望弥撒訖，遇樊主教云：……法欽使亦愿入报館股，但愿开于京中。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覺灵通，但天津諸友必以为不便設于京中，恐多不愿入股者，俟后

商之可耳。”^① 这里所記的法欽使，就是
 签字于辛丑条約之上的法国公使 鮑渥。
 (樊主教所入的十股是多少錢，以及法国
 公使入了多少股和多少錢，現尚无从查
 考；英斂之对法公使的入股是很重視的，
 他的日記說“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
 大”，可見一斑。) 英即函詢天津柴天宠，
 柴复函云：“設館無論京津，津友皆愿，但
 求勿拒我等入股本，为幸。”这說明柴等
 是愿意同法国公使合伙开这个报館的。
 事情还有曲折，八月十七日(旧历七月初
 四日)日記云：“由津至京，进堂見樊主教
 云：当速办，現已令人画房样。始知欲設
 堂中，大不便，然未遽駁，俟商之津友。”
 法国人同中国人合伙办报，要把报館設
 在北京天主教堂里，的确太笨了，而英斂
 之却“未遽駁”。他写信問天津，柴天宠
 李敬宇来函，皆不贊成設于教堂中。八
 月二十七日(旧历七月十四日)日記云：
 “复見主教，蒙示以現与欽使商妥，立于
 津上为便。予即云：此事已定，愈速愈
 妙。”这可見公使比主教高明。大局既
 定，英即回天津，携带款項到上海訂購机

二十日 星期進中 望 陽 報 館 設 法 欽 使 處 遇 樊 主 教 云 梅 先 生 云 欽 使 欲 設 報 館 但 願 開 於 京 中 予 思 有 法 欽 使 固 可 大 擴 充 息 之 自 然 天 津 諸 友 必 以 為 不 便 設 於 京 中 恐 多 不 願 入 股 者 俟 後 商 之 可 耳

(英斂之日記)

① 有照相鋅版为証。

器聘請主筆去了。

英斂之九月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四日即至中外日報館訪汪穰卿，請汪代荐一位主筆。汪穰卿名康年，是上海当时的名士。^①在英請汪荐主筆的一段交涉中，証实旧大公报接受了洋款，因此使汪穰卿等羞与为伍。此事值得一記。汪穰卿推荐了一位姓蔣名智由字心斋的堪为主筆。^②十月五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晚，汪穰卿在四馬路万年春設宴介紹英、蔣見面。同席者还有：杭辛斋、廉惠卿(此二人正筹备在北京办报，到上海购机器)、汪建斋(名立元，是汪穰卿的族弟)、梁幼海、史子岩、朱志尧^③。英的日記說：“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时极久，旋陸續去。穰及建斋与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④这是汪蔣三人劝英勿用外国人的錢办报。轉天，十月六日(旧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說：“书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⑤这是說他办报不能不接受外国人的錢，而且是法国公使的錢。从此聘請主筆的事就发生了波折。据英斂

二十四日
早九點進
與山西田治直
話長發棧與史子岩約午時晤明可同
書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
建斋與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
日已十點半
歸國至五點赴四馬路萬年春汪穰卿約同席杭辛齋廉惠卿梁幼海陝籍生京中蔣智由心齋即汪荐予主筆者史子岩致堯及予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时極久旋陸續去穰及建斋與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
日已十點半

(英斂之日記)

之的日記，十月八日（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晤蔣心齋，詢其愿否北上？答云：恐难得昌言之权，故不愿去。予乃告以論說准各具名，不相混淆。俟后再議。”十月十日（旧历八月二十八日）晚，英在江南春宴客，主要的客人是汪穰卿和蔣心齋。“蔣告現同趙祖德开办《选报》，不能北去。”蔣心齋謝絕了英斂之的邀請。英此夜“臥不成寐”。此事原可至此而止，忽然异峰突起，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二日）的日記說：“是日得志尧函云，汪穰卿毛遂自荐，愿去本館，

-
- ① 汪康年，字穰卿，是《时务报》的中心人物。《时务报》創刊于一八九六年，梁启超任主笔，汪任經理。一八九八年汪另出《时务日报》，后改为《中外日报》。英斂之到上海聘主笔时，汪正办《中外日报》。汪以后又在北京办《芻言报》。汪属于强学会系統，是保皇派。
- ② 蔣智由，字心齋，別号观云，他的儿子蔣尊簋在民初做过浙江都督。蔣智由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有名人物，他曾同蔡元培、林少泉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借此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工作。中国教育会分子开办爱国女学；蔣被推为經理（当时无校长名称）。蔣智由当时被目为新党，他当然不肯帮助英斂之去办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了。
- ③ 朱志尧这个人很重要，是英斂之在上海的几十年好友，与旧大公报有密切关系，是旧大公报的股东。朱志尧（名开甲），是馬相伯的外甥，生长于累代天主教徒的家庭中，他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在旧大公报創刊时期，他已在法国东方汇理銀行中服务，以后在这个代表法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銀行做了几十年的买办。他是个买办資本家，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是他投資創办的，以后又陸續搞別的企业，他曾投資开办上海南市华商電車公司，因此上海南市的電車大部分是由求新机器造船厂制造的。这个人是上海天主教徒中典型的买办資本家。現在見到朱志尧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下列的十項职銜：“教皇欽賜圣西尔物斯德賽騎尉勛位；三等嘉禾章；上海总商会費城賽会代表；上海公教进行会 副会长；上海华商电气公司 董事；上海大通輪船公司 董事；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 董事；安徽宝兴鉄鑛公司 董事；上海新祥制造机器厂 主任；上海同昌紡紗榨油公司 主任”。其中单单未列东方汇理銀行华經理的职銜，大概是有所諱吧。

- ④⑤ 同見一张照相鋅版。

明日可将合同眎予。予得信甚为詫异,意其别有隐衷。日前力阻予,万不可入洋股,謂定遭压制,今反欲就何也?然予以为苟有益于报事,不妨曲从之。因其交游博,声誉隆,既消息灵通,复销售宽广,虽月出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較碌碌凡庸远过十倍哉?”十月十六日(旧历九月初五日)日記云:“汪穰卿寄所訂(拟)合同来,見其欲独攬大权,薪水但索五十元。”英是夜又“臥不成寐”,“挑灯作复穰卿信,并酌改合同。但其与設报宗旨不背,一切小节,予頗可曲从,因开創需人,伊又为老手故也。”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云:朱志尧轉到汪穰卿函云:“所議不符初約,深恐不易措手,只得敬謝不敏”云云。汪已明白謝絕了,但英仍不死心,日記續云:“予見其前日晤商情形,似有成議,意其今故作波瀾,以要挾大权独握也。”二十六日(旧历十五日)日記云:“予意如无合适主笔,可姑允穰卿襄办一年,彼时再作打算。”二十八日又到汪穰卿处面商,“以索薪水太昂,故不能延至。”这是汪穰卿以索高薪的办法打断了这段交涉。英斂之欲聘蔣汪二人,先后失敗,求計于馬相伯,馬建議商之张元济(字菊生),另荐他人。英曾几次訪张,张不肯荐人。十月三十一日(旧历九月二十二日)日記云:“馬公(相伯)東云:得张菊生函云,报出自旗人,尤难。自当尽力襄助,主笔任重,未敢輕举,好在尙有时可商,当加意为之訪詢云云。”这是說,张菊生不愿意給滿洲旗人办的报推荐主笔。英斂之这次上海之行,訂购了机器和鉛字,請主笔的事失敗了。他于十一月三日登上回津的輪船,在船上悶讀《天演論》。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記云:“竟日臥,头悶,大不快,甚悔此次之行为大寻苦恼。”

英斂之回天津后,往来津京,筹备报事。十二月初又到上海,仍求汪穰卿介紹主笔,汪这次推荐了一位方守六,条件談妥了,訂

了合同，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上旬同船到了天津。方守六是帮助英斂之创刊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

鑼鼓漸漸紧了，大公报館要开张了，英斂之于五月三日(旧历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天主教堂訪樊主教，此日的日記云：“晤樊主教云：法欽使已应保护之事。”这是法国公使鮑渥正式应允保护大公报了。距离大公报出版第一号报的前七天(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旧历五月初五日)，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李敬宇，“以工部局告示囑印，旋印成送去。”(据英的日記)大公报的新印刷厂还未印报，先給法国工部局印了告示，可見英斂之的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从这段办报緣起看，英斂之原无办报之意。他于一九〇一年春天，在上海穷极无聊，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他所汲汲以求的，只是要謀得“一枝有托”，以解决职业和生活問題。是柴天宠提議办报館，并愿“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墊”。据英斂之日記，在柴天宠提議办报的一个多月以后，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五日(旧历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云：“张寿峰来，告以刘鐸来，遂至堂，候有时，晤，刘鐸聞主教等議，令予至北堂办理要紧文件，薪水从丰云云。予謂此間报館事已有头緒，中輟頗为可惜。”这是說假使不是柴天宠提議办报在先，英斂之的职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天主教堂为主教办理要紧文件了。按照历史規律，象旧大公报这样一张为某个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階級以至为传播洋教的利益而服务的報紙，在华北是終究要出現的(以后的天津益世报就是一个)，但办报的人就不一定是英斂之了。是柴天宠独具只眼，看出英斂之有办报的才干；他当然不是簡單地为了給英斂之解决职业問題，更主要的是“柴先生等”为了他們的階級利益有办报的需要。柴天宠等需要英斂之办报作

天主教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法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也愿意有这样一张崇洋抑华为帝国主义利益说话的报纸供它利用。英斂之崇教崇洋，胆大能文，有办报的能力；有报在手，职业问题解决了；用这张报，为了天主教买办资产阶级和法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还有一个也很根本的想法，就是为了满洲人的利益以永保“大清天下”而服务。所以一拍即合，大公报就呱呱出世了。

大公报的最初馆址设在天津法国租界狄总领事路(Rue Dillon, 一名六号路乙,即现在天津哈尔滨道四十二号)，对门就是法国工部局，隔一条街就是法国领事馆，当时八国“都统”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国 General Jefeve。大公报就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旧历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受着法帝国主义的直接保护而诞生了。第一号大公报印了三千八百份。

英斂之是旧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他自任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英本人是满族保皇派，又是天主教徒。倡议办大公报和最初的投资人多数是天主教人物，如同柴天宠是天主教资本家，张少秋、朱志尧是买办资本家，王郅隆是投机商人官僚资本家，李敬宇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樊主教、雷鸣远等是外国神甫；更突出而也特别隐蔽的是法国公使鲍渥也投资为股东，这是正式的帝国主义。此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翻译《天演论》也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就入了一千元的股。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的大公报登有通知股东“改用新票……分派红利”的广告，可见还有若干小股东，大概都是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分子。从阶级关系来看，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乃是一个以满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结合法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旧大公报既是这样的阶级产物，它就为这样的阶级利益服务，这就规定了旧大公

报言論編輯的方針和內容。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旧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

近代的中国新聞事业,在初期比較站得住脚的报館,几乎都同帝国主义有关系。上海申报开办于一八七二年,是英国人美查办的;上海新聞报开办于一八九三年,是英国人丹福士办的,以后于一八九九年为美国人福开森接盘。后起的天津大公报,表面上是中国人办的,而骨子里是法国人同中国人合办的。不把外国資本表露出来,这是英斂之比較高明的地方。这几家报館,都設在上海或天津的外国租界里,已非中国行政权所能管轄,而且还有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更有恃无恐。这几家报,若是沒有帝国主义的勢力撑腰,它們是很难持續存在下去的。以大公报而言,它一創刊,就放言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若不是在八国联軍占領下的天津,英斂之是首領难保的。以袒帝者反对媚后者的关系,英斂之的大公报一貫反对袁世凱。一世之雄的袁世凱,直隶总督的交椅摆在天津,他对英斂之无可奈何,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大公报;英斂之和大公报却以此得“敢言”之名。以后楊士驤任直隶总督,那就更不足畏了。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旧历九月二十五日)英斂之的日記說:“方蔭雨^①来言:吳錢孙向彼言,楊督謂我报譏彼,大怒。本欲交涉,因不便,遂止。托囑此后务留情面云云。并訂游孙家花园。”两天后(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記云:“晡,孙仲英以馬車来迎予至彼花园。时以昏黑,引觀各处訖,方蔭雨亦至,二人同劝慰,此后淡視国事,随时游戏,为佳。留彼飯,意甚殷殷。”这可算得一幅官場現形

① 方若,字蔭雨,是一个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文人,是日本在天津开办的《日日新聞》报的社长兼主笔。一九〇五年英斂之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就是經過方若的牽綫。此人后来在抗日戰爭中在天津当了汉奸。